



我为冯驩才写传

杜仲华

传主进行多次且充分的交谈,但冯驩才当时正忙于天津大学冯驩才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无法抽身。

“我没时间谈。”他有些无奈地说。“我没时间谈,我怎么写呢?”“这样吧,我出一套书,‘记述文化五十年’,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绘画创作和文化保护史,你了解的,你想了解的,可以作为写作的依据和参考。”还有文本的体例和风格,应当如何把握?他问我看过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吗?我说看过。但我认为《名人传》偏于理性,比较深奥,属于阳春白雪,一般读者可能读不进去。我个人比较喜欢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通俗易懂,比较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但《渴望生活》采用的是小说写法,有大量想象和虚构,显然不适用于冯驩才的传记,只能借鉴它的一些叙述手法,如尽可能加强情节性和细节描写等。我按照这样的思路,参考冯驩才回忆少年时代生活的散文,写出了第一章《梦想起飞的年代》。冯驩才看后未置可否,建议我将书稿交给出版社,请他们出个意见。几天后,出版社的反馈来了:“我们觉得杜老师文笔很好,写得生动有趣,可读性很强,完全符合我社的出版要求。”

“那就按这个思路写吧!”冯驩才开了“绿灯”。“我先写着,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什么时候谈,可以吗?”“好吧。”

我从当年10月动笔,每写一章,就给

冯驩才和出版社传一章。一直写到翌年春节前,冯驩才也没抽出时间。我对他说,“春节放假时,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谈一次了,因为您和顾老师初恋的故事,还有您当篮球运动员的经历,找不到相关资料,需要我们面谈一次”。就这样,大年初七,我到他家面谈了一个下午,把需要补充的内容全都补上了。他又对我已经完成的书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写作中我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冯驩才的“记述文化五十年”中,选择和提炼出我需要的内容,把它放到全书的总体架构中,用我的语言方式表述出来,而不能照搬照抄原文。难就难在这里。好在,正如冯驩才多次肯定的,我的“整理”能力较强,首先,我把“记述文化五十年”的内容,与一些零散的、采集自多种渠道的信息,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将他的人生经历与特定时代背景糅合在一起,将史料与故事糅合在一起,将他的事业发展与家庭生活的变迁糅合在一起,从而构建起一条以时间为顺序的、相对完整的、线形的情节链。其次,我在研读他小说的基础上,在书中评介了他的代表作《铺花的歧路》《啊!》《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艺术家们》的创作过程及社会影响。再次,选用了历年来我与他就艺术创作、年文化、现代文人画、中外文化比较、民间艺术和非遗保护等问题进行的深度访谈。最后是我随他到各地进行文化考察时,所记录的考察过程和一些生动有趣的细节。有了这些长期积累的素材,写起书来便得心应手,水到渠成了。

经过四个多月的创作,这部全书分为十二章,八十五个小节,二十余万字,最后定名为《天生我才:冯驩才传》的传记作品结稿了。又经过出版社半年多的精心编辑、制作,2024年11月,《天生我才:冯驩才传》终于付梓了。冯驩才看到样书后,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他说:“这个版本很有当下阅读价值,是你的精品力作。”得到传主这样的首肯和称赞,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和预期的。

有人问,你想通过这本书,让读者得到哪些收获和启示呢?我觉得冯驩才名气很大,社会影响很大,但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十分了解,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系统地梳理和解密他的成长史、奋斗史和成功史,使读者看到一个此前他们不了解的、立体的和鲜活的冯驩才,并从他的人生故事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教益。比如,他的成长过程中有阳光普照,也有阴霾密布,而恰恰是在逆境中,他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与恶劣环境打交道,从而找到了文学这个他托付终生的事业,于是才有了他的“伤痕文学”,文化反思小说和“俗世奇人”系列等文学成就。正如他自己所说:“命运从来都有两面性,负面的东西对人往往是一种真正的挑战与锤炼。人的意志与能力是被命运逼出来的。”其后,他作为一个“行动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非遗保护,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种种曲折和阻力。为了抢救濒临消亡的文化遗产,他一次次卖画,将其所得无偿捐赠给社会。他每次卖画都像卖血一样,产生一种悲壮感。所以我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人——第一,从他身上学到了为了理想和追求无所畏惧、知难而进、决不轻言放弃的奋斗精神;第二,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而要有情怀,有些担当,有些社会责任感,为这个时代留下一点东西,作出一点贡献,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在这方面,冯驩才无疑是我们的楷模。“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的这一千古名句,不仅适用于冯驩才,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就看你是否有这种自信,有无他这样的奋斗精神了。我想,这也是《天生我才:冯驩才传》要表达的主题和给读者的最大启示吧。

华说华服

人类在过度开采自然之后回归与其和谐共生的意识,显示着文明程度的大幅提升。如今循环经济受到高度关注,这里突出的是对资源的再利用,大到航空航天,小到牲畜养殖,当下更有不少人于日常生活中,正在打破线性消费模式,转而成为循环消费。以服装为例,人们不再是购买——穿用——废弃,而是热衷于在网上卖旧衣、买二手。这些数据显示,闲置物品交易的主力军是“Z世代”。相关专家认为,这些“数字原生代”,愿意在时间沉淀后将闲置物品的剩余价值让渡出去,这是用来平衡冲动消费的理性选择。更深一层说,随着数字技术升级,物流成本降低,线上闲置交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细分需求难匹配、定价标准模糊化、信息推广碎片化等问题,总之是极大地升级了资源整合能力。

这种理性消费和学术性探讨,实际上是针对20世纪后半叶以及21世纪前20余年的反思。因为所谓线性消费主要起因于现代工业的大力发展,如服装面料广泛开发化学纤维以后,相对快捷的制作工艺,相对廉价的化纤织物和塑料制品,催生了人们用过即废弃的行为模式。古代甚至现代本不是这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时代,人们怎会轻易丢掉衣服呢?宋代苏轼《鹤鹑图》里有一句“谁复挑灯夜补衣”,那是常有的事。上世纪50年代初,家家主妇都有针线筐,灯下缝补袜子是不分穷富的。确实棉线袜不结实,也确实各家都有旧衣可以剪成块儿补袜子。最有情感趣味和工艺水平的是“百家衣”,新生儿女会按照民俗将穿好染成红色的鸡蛋,托着盆儿给邻里挨家送去,各家则纷纷拿出自己家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放到盘子里,作为回赠。新生儿女将这些布头儿剪成一样大的方形或三角形,然后将其拼接成整布,做成儿童的棉被、棉褥、棉尿布等。那真是手艺,而且在民间被认为是集百家之福。“百家衣”在今人看来或许是土气朴拙的民间艺术,实际上当代也有,

循环消费中的服装

华梅

只不过称之为“拼接艺术”或“拼布艺术”,显然现代感十足,我则看它与明代的“水田衣”不差分毫。这些做法别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资源的再利用。

《天津府志》记载,元代王德信在《直沽海口》一诗中写道:“东吴转海输榷稻,一夕潮来集万船。”正因天津兴于漕运,因而建立之前即为商贾交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明清之时,大型商业兴旺发达,天津大沽口到三岔口等地,正是“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之状,谁能想到这里最有名的竟是“估衣街”。所谓估衣,即今日所说的“二手货”,指穿过但仍然很新的旧衣。当年估衣的来源主要是典当铺里无力赎回的“死当”。明末清初仅此一地的估衣铺就有30多家。清道光四年(1824年)诗人崔旭写成的一首诗,描绘了当时估衣铺的经营活动:“衣裳颠倒半非新,掣领提襟唱卖频。夏葛冬裘随意买,不知初制是何人。”当年没有网上交易,可是卖估衣讲究“唱”,地上堆着好多衣服,两个壮实且聪明的伙计随便拿一件,就能吆喝出有腔有调的唱词。唱词内容任意编,内容越丰富越吸引人;越是唱得好,越能做成交易,那也是很有时代特色的,不亚于如今网上各种销售平台。

长期存在于民间的早市、夜市、跳蚤市场,也有卖二手衣物的。那也不是循环消费的一种形式吗?上世纪初至70年代,大城市里活跃着委托店,店里卖的都是二手衣物,好像看起来比早市的高档一些。衣服不是堆着,而是挂在那里,不乏皮衣、毛毯等。有一些衣物看上去质量好着呢,“出身”本是很高档次的。记得上世纪60年代提倡艰苦朴素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为普遍现象,那是实实在在的循环消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拿着家里不再穿的衣服去换塑料制品,街头的那些经营者摆满一地塑料盆、塑料筐、塑料椅子等,收旧衣换塑料,也是街头一景。大家觉得很自然,不是丢面子的事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已不屑于拿不穿的衣服去换塑料制品了,即使街上设有专门的捐旧衣物箱,有的人也觉得很麻烦。随手一扔挺省事的行为,似乎是与一般衣服价格不高有关。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迫近,人类重新认识到资源的珍贵,我们不能任意开采开发,不能再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世界几大经济体已将其视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主要路径之一。如今我们购置的衣服就可以进行循环消费,既能够随穿随新,又增强节约意识,这个时髦是积极信号,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吧。

题图:天津工业大学2024届毕业设计作品,作者廖晓昕



近代天津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如1927年成立的百岁公司是我国较早专门设计、生产和销售儿童服饰的企业,旗下的“双童”牌儿童服饰,对推动和引领我国儿童服饰的创新及品牌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从成立之初百岁公司就致力于提倡妇女有职业,在这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我国传统的儿童服饰,基本都是在家庭内部由家人或负责做衣服的女佣等手工缝制而成,样式往往就是成年人服饰的缩小版,如幼儿时期的男孩常身穿长袍马褂,一副“小大人”的装扮。西式儿童服饰传入天津后,受到知识阶层及一些追求时髦人士的喜爱,认为比传统儿童服饰更加活泼美观。不过,当时一般的家庭妇女通常都不会裁制这类新式服饰,请裁缝做的话,手工费又很贵,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到商店购买做好的成品。当时国内市场上几乎所有的西式儿童服饰都是国外品牌。与此同时,近代以来随着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和妇女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和就业。在夫妻双方工作都很忙碌的情形下,如果能由企业集中生产和销售小孩所需的各种服饰,免除孩子父母四处奔波购买的麻烦,必然大受欢迎。基于上述考虑,时任长芦盐务稽核分所建地委员会主任的陶守贤和夫人冯淑贤敏锐地觉察到:由于时代趋势,新式儿童服饰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社会需求,有鉴于此,为了发展民族品牌,提倡妇女有职业,于是二人集资创办了百岁公司,专门制作和销售新式儿童服饰。

1927年5月15日,百岁公司正式对外营业。刚创办时,陶守贤夫妇同为经理,此外还有5个股东。不久之后,陶守贤调任外地就职,其他股东也因离开天津退股,百岁公司实际由冯淑贤独自负责经营和管理。公司分为营业部和工厂两部分,产品先是在自家工厂设计和制作完成,然后一部分销往外地,一部分在本地营业部售卖。

百岁公司的产品最初种类甚多,几乎无所不包,既有儿童的衣帽鞋袜,也有各种关于儿童的木制家具,如床、桌子和椅子等。不过,本着做精做细的原则,公司很快缩小了经营范围,专心从事儿童服饰的制作和销售,品牌为“双童”。“双童”牌儿童服饰的目标客户主要是从新生儿到12岁年龄段的儿童,种类有一年四季的服装、帽子、皮鞋和袜子,款式主要是仿照和采用法国最新款的儿童服饰款式,面料以绸缎、布和呢绒等为主。除呢绒以外,原料大部分采用国货,绸缎和布从

津派文化与近代化(九)

双童:天津最早的本土儿童服饰品牌

成淑君

元隆、敦庆隆和国货售品所购买,呢绒则由华亨洋行、鸟鲁生洋行、俄商克林尼士基洋行供货。

百岁公司开创初期,因为对儿童各个年龄段衣服尺码的大小缺乏经验,所以在服装设计方面经历了种种困难。经过几年的摸索才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无论肥硕或瘦小的儿童,自从出世一天起,一直长到十二岁止,四季的衣服,都有了合适的裁剪及缝制。”“双童”牌儿童服饰出品最多的是幼童西服、海军服、连衣裙、女孩洋衣、大髦、毛线衣裤、皮鞋、洋袜、帽子等,生产量相当可观。据记载,幼童西服、海军服、连衣裙和女孩洋衣,月产量均在5000套到8000套之间,洋袜的月产量也达到了5000双。百岁公司还接受社会上的衣服定做,尤其擅长设计和制作西式婚礼上花童的着装;此外,还承做学校的制服。

百岁公司的日常销售量以冬夏两季为最多,其次是秋季,春季最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夏天单衣花费少,而冬天的大衣和毛线衣裤在家庭中难以缝制,所以这两季的儿童服饰购买踊跃;春秋两季西式衣裤不便于套穿,因此这两季中儿童多穿中式衣裤,销量就随之减少了。销售的区域,一部分销往东北地区和上海、南京等地,一部分在天津本地的营业部出售。营业部最初设在泰康商场一楼,因生意兴旺,1928年动业坊开业后搬到了这里。

“双童”牌儿童服饰非常注重宣传和营销。当时的《大公报》上不时刊登其在节日或特定时段优惠促销广告。1930年10月,天津市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儿童幸福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百岁公司提供了“双童”牌儿童服饰作为获奖儿童的奖品,以此来扩大品牌的影响。此外,百岁公司还积极参加在河北、威海等地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国货陈列馆等的布展等,并多次获得优等奖和一等奖。

百岁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冯淑贤,毕业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她创业除为发展儿童服饰的民族品牌外,还有就是提倡妇女有职业,为生活困难的女性在社会上谋取生存机会。为此,从公司负责人、营业部里的店员到工厂里的工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女性,这在当时的天津可以说是极为少见。

物美价廉的民族品牌新式儿童服饰,加上提倡妇女有职业的双重因素,使百岁公司在短时间内迅速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关注,也收获了广泛的美誉。《庸报》《大公报》多次刊登记者对百岁公司的访问调查。尤其《大公报》著名记者蒋逸晋发表在该报上的天津妇女职业生活系列采访,就包括了对百岁公司营业部女店员和工厂女工的两篇调查。同在《大公报》的名编辑、小说家何心冷,特意在报纸上为百岁公司的儿童服饰做宣传,认为这些儿童服饰的差不多都是新式的,比较有利于儿童的发育和运动,如果能够推行到全社会,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改革。



天津市中心公园位于和平区中心地带,环状花园路将其围在中间。该园占地1.27公顷,圆形场地具有典型的法国园林风格。1995年在此处敬立了吉鸿昌将军塑像,公园周边历史风貌建筑、名人故居众多。我的这幅水彩画构图上取公园中心的西式八角双柱亭为主体,阳光洒落在亭柱上和绿茵茵的草坪上,熠熠生辉,使画面凸显出时光的积淀感。

拾光岁月·天津中心公园(水彩画) 叶武 文并图

读书随意味才浓

鲍奕豪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在其名篇《谈读书》中,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读书怡情”。在专门为了功利而读书的人听来,也许会觉得可笑,甚至还会认为“迂腐至极”。独处幽居,最宜于读书怡情。寂静无人之时,捧着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一口气读下去,学起陶渊明那“不求甚解”的洒脱。不作读书笔记,不写读书心得,无须强记硬背,更不屑顾忌晋书考试之类的劳什子。读到得意时,摇头晃脑,

以书中人自况;读到悲伤时,潸潸然以袖拭泪;读到困倦时,则抛书和衣而卧,顷刻鼾声如雷。偶读古人书,有时竟意外地发现,古人早已替我发出欲发而未发之言。于是乎喜形于色,不禁拍案大呼:“知我者,古人也!”恍惚中,仿佛东坡、稼轩不邀而至,和我比肩而坐,娓娓而谈。此间门客,没有“恨不古人吾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感叹,但有“恨不能纵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的遗憾。

我在德国达姆施塔特游览,感觉达姆的绅士花园与7月开幕的达姆夏节的现场虽位置毗邻,但却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景象。迈进园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湾小湖,近处呈长圆形,远处湖水绕过横亘水中的“微半岛”,向草木郁葱的绿色深处走去。湖畔草坪上,三五成群的水鸭在争相觅食、交互摩擦;已在湖中的,或低头入水,或随波漂游,一展戏水画面;扭捏上岸的,先抖身拍羽,后进入友群之内。这时,才发现此湖水浅,微半岛上的高树倒映湖面,湖水既清澈见底,又碧绿可人。绅士花园名不虚传。花园尽头开设一个小小图书馆,馆里四壁皆图书,摆着简朴桌椅,可就地翻阅,也可取走品读。这一机构便于游人小憩,也为观赏胜景心生灵感者当即自书本查询数据和印证,或素抱疑惑者寻求答案,提供了随时进出、信手利用的场所。离图书馆不远处坐着瓷器展览馆。正门下的多级台阶,显示展馆的庄重;两层结构,瓷器珍藏二楼,知会展品的珍稀。一些酷爱瓷器和研习美术的



人士上得楼来,渴求的心目即徜徉于至美艺术的天地之间。在绿树成荫的一块平地上,几多老者兴致勃勃地玩一种游戏:抛球球滚向一个标杆红球,凡三次,由裁判累计球球与标杆球间的距离,谁的球离得最近,即判为优胜。只听到球球触地的轻微音响,无人喧哗,堪称一场无声的赛事。总之,绅士花园一片紫紫嫣嫣、阵阵鸟语花香,十分宁静清幽。然而,与花园只几步之隔的夏节场景,却极其热闹。夏节的热点是购物和游艺,而实际上夏节已成为少儿甚至幼儿的狂欢节,购物的气氛反倒被压抑而显得微弱。少儿狂欢主要向天空放飞,在地面奔跑。搏击天空,为一乘坐巨型龙船,左上右腾,在空中来回游荡;二为打高过十几米的秋千,飞翔的高度

花园与儿童

程绍海

几与横杆持平,惊险得很;三为超大转盘绳挂于座椅,转动起来带动座椅快速平行飞驰,场面无比刺激惊悚,当听到从座椅上传出的呼叫声时,观者无不胆战心惊;四为弹跳起的游戏者双手持竿,双脚蹬弹性体,宛如飞禽展翅冲高空,往复弹飞多次,此项虽不构成惊心动魄的险象,但也需具一定胆量方能尝试。上述四项的参与者大多为少年儿童,而地面上的活动的主人就属幼儿一族了,有的还需父母陪护在侧。一列火车、各类汽车绕圈环游,幼儿坐在驾驶室内,手握方向盘,

却有人偏偏不理解个中滋味,说:“你读的书,写的‘豆腐块’跟评职称扯不上关系,一点儿用处没有!”此言一出,令人煞风景!居然有人不知读书为何物!语出如此乏味,居然不可耐。不懂得读书的真正乐趣恰在“无用”之时,而读书的用处又恰在“无用”处有用。若为升学、为就业、为晋职、为出洋而点灯熬油,头悬梁锥刺股,这和真正的读书风马牛不相及也。读书,越随意,越有意思。言哉是言也!

题图摄影:刘明辉

充当小司机,幼儿们不时手拉响铃,挥手向爸妈致意。这项活动除了让孩子们感到快乐外,目的还在于培养他们的主动性,自小养成做事的观念、自信心以及面对前行的思维。少儿、幼儿借以游戏的多种器具,装饰得五颜六色、富丽堂皇,加之孩童发自内心的好奇好动、好说好笑、好奇好玩、好喊好嚷,整个夏节充满狂欢的气息,变成欢腾热闹的海洋。供休闲,花园的功能;尽欢乐,节日的主题。绅士花园与达姆夏节为功能与主题所决定,陈列、装潢的样式、风格各异,游玩、享用的形式不一。同时,这也表明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需要,因之产生了适合不一样生活的设计、设置、设施,以满足不一样的人群之欲求。